

由“形式”之殇看文化符号学的开放性发展

王镇

摘要 苏联的文化符号学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极深的渊源,都有共同的语言观和符号学观,谈及文化符号学就不可能不提及俄国形式主义,而俄国形式主义的迅速湮灭可谓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所以,对于“形式”之殇的反思和总结会对文化符号学的开放性发展产生积极意义,有助于中国文化符号学发展的稳定、开拓、创新和流长。

关键词 俄国形式主义 形式 文化符号学 开放性

DOI:10.16238/j.cnki.rla.2016.04.018

On the Openness of Cultural Semiotics Developmen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bortion of Russian Formalism

Wang Zhen

Abstract The former USSR cultural semiotics and Russian formalism are so closely related that they share many ideas in language and semiotics and often appear in the same topic concerned.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much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abortion of Russian formalism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centrate on the openness of cultural semiotics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teady, innovative and prolong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semiotics.

Keywords Russian formalism ; form; cultural semiotics ; openness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自前苏联引介的文化符号学已在中国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符号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在现当代各种西方文论流派纷繁复杂、往往勃兴骤亡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符号学的发展问题也是本土学术圈所关心的一项重大课题。由于苏联的文化符号学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极深的渊源,在研究重心上存在鲜明的符号学异同点,而俄国形式主义的迅速湮灭可谓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所以,对于“形式”之殇的反思和总结会对文化符号学的开放性发展产生积极意义,有助于中国文化符号学发展的稳定、开拓、创新和流长。

一、“形式”与文化符号学的渊源性

文化符号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渊源性颇深,谈及文化符号学就不可能不提及俄国形式主义,毕竟,二者都生存在同一片地理和文化版图内,都有共同的语言观和符号学观,但如果不了解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形式”等核心概念对后来出现的包括文化符号学在内的各种理论学说的影响,不清楚“形式”等思想的来龙去脉,就无法真正理解,更无法充分借鉴西方文论的洞见卓识来发展中国本土的理论学说。

俄国形式主义诞生于俄国十月革命酝

酿、爆发期间,当时的文化空气相对自由,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陷入停滞并受到广泛的责难,而同时,长期在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中被视为理性之工具的语言的地位骤升,语言学本身的研究对象也陡然由研究某种具体语言的具体语言学扩大为研究人类语言共性的普通语言学,语言学理论开始被应用于哲学、诗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语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准,对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和世界性的影响。

俄国形式主义者生逢其时,他们开风气之先,将语言学引入诗学,追求陌生化效果和文学性等独特的诗学价值,强调对文学形式的重视,甚至疾呼“形式决定一切”,以致被人强行冠以“形式主义”之名,但为了方便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妥协和磨合后,“形式主义”还是成功过滤掉了其中的纯粹唯心主义的贬义意味,最终成为该文学流派的代名词并被欧美学术界广泛接受。可以说,当时俄罗斯及欧美诗学、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时普通语言学理论在欧洲的全面推广对其“形式”的提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形式”这一传统影响之下,后来的前苏联文化符号学专注于文艺和文化批评,在研究内容、方法、风格、重心、倾向等方面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的丰富营养,也强调文本的核心作用以及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平衡,用非严格分析方式关注文化与语言的联系,特别是文化意义转向上的“偏离”。基于对“形式”精髓的共识,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洛特曼和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乌斯宾斯基都对各种语言进行分类,把不同语言分成第一性和第二性语言,从语言模拟系统的视角探讨文化现象,这种渊源关系也证实:“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趋向,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说成是唯一正确的看法。”^{[1] (13-14)}

二、“形式”之殇的究因

遗憾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无地利人和,

导致其于上世纪30年代迅速衰亡。首先,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在强敌环伺的生存压力下很快确立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并且在文艺学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的诗学思想号召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自由的大业中,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并支撑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而形式主义要求把文学作为自成一体的独立学科,追求类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研究。在《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2] (前言11)}雅各布森认为将文学当作外在世界的印证很肤浅,一味地彰显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只执着于探求文学作品的内在规律和艺术的程序,日尔蒙斯基甚至把艺术作品视作等同于程序的总和,宣称艺术作品中除了程序外再无他物。这种偏激的理论学说近乎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而对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不闻不问,因而受到官方的批判乃至打击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情况对当代的国人来说应是感同身受的。

正如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先生的战斗檄文类的杂文更符合时代的需要,而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林语堂、林清玄的品味人生性的散文更受欢迎一样。的确,当一个国家面临着外族刺刀的压力或威胁时,她的民族反应不可能是形式主义的纯文学研究式的悠闲,即使放眼今天的世界,也只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国家能够提供如此理想安逸的学术环境。无论如何,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享受文学乐趣的同时,都应该同时尽量自觉地把自已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某域外强国的军舰和飞机整天在国人家门口转悠的时候,中国官方也号召文艺界“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3] (125)}同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4]

其次,单从学术性上来讲,俄国形式主义既反对心灵观,又抵触社会观,只关注文学的“形式”问题,什克洛夫斯基在其《关于散文的理论》中宣称:“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2] (前言 14)}形式主义偏执地想象用直观经验以单一化、分析性的手法研究文学表达形式与文学内容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几乎从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性以及符号意义的不断变化,不理解“在符号王国里,语言符号……是非常独特的一部分”^{[5] (68)}的真正含义,这种单一、封闭、僵化的研究思路与传统的人文思想以及人类多元化知识的交流趋势脱节了,即使没有外来的政治打压,它究竟还有多大的理论发展空间也不容乐观。

在形式主义暴露出其致命性的理论和实践缺陷后,巴赫金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立场出发,对形式主义的“去社会性”、“独立封闭性”和“形式化”的理论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代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把科学任务极端简单化,以及把握研究对象上的表面化和平面化:这种研究工作只有在语言艺术创作的外围运动才显得充满自信,它竭力回避一切使艺术归入人类文化统一整体这个大范围的问题,竭力回避只能从广阔的哲学取向上才可能解决的问题:诗学死死抱住语言学,生怕离开语言学一步”。^{[6] (256-257)}

正因为此,在学术批判、政治打压和自身反省的合力作用下,雅各布森被迫出走异国他乡,而什克洛夫斯基开始重视文学社会性,并于1930年初正式宣告放弃形式主义。这标志着形式主义在苏联走向了终结,但同时也促使形式主义者正视并弥补理论上的软

肋,使得形式主义在欧美等多地改头换面,继续发展并深深影响了后来包括文化符号学在内的西方文论思想。

三、“形式”之殇对文化符号学开放性发展的启示

在文学和文化天然结合的语言学观批评中,“形式”的单一、封闭、僵化的“绝对向内转”思路显然只能视作短暂、临机、适时的方法,而不适宜作为长期支撑理论分析的策略,因此,缺乏开放性是“形式”的致命伤,也是“形式”之殇对文化符号学发展的一大启示。

任何阶段任何一领域上的学术研究都处在主观性、知识性和社会性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网中,都受到思想与现实共同作用的影响,也都应该对所分析和处理的“素材”进行开放性的选择和互动。文化符号学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符号,应加强对语言文字和社会文化内在联系的研究,考查各民族及其社会如何运用符号来展现该集体统一的表现、发展、内涵和文化特性,这也决定文化符号学的工作模型必然是开放性的,这种特性是它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本质区别。

俄国形式主义者以为个体只需单凭主观感知、个人倾向、主体旨趣等就可在一个封闭的文本环境中工作,坚称“文学性”和“意义”等都不是由“内容”规定,而是由“怎样”和“方式”这样的形式关联界定,最终人为地给自己戴上学术镣铐,使自己丧失研究自由,这样,哪怕其方法再先进、其目标再精确(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其结果也必定是片面的、不实际的、不科学的。

正是敏锐觉察到了“形式”的硬伤,洛特曼指出,文化是人的社会存在条件,既表现为综合性的记号系统或结构,又表现为复杂的信息传递系统,于是文化将作为社会单位的人和作用于人的现实联系起来,形成在外部世界和人的信息之间的加工和组织机制,因此,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语言、社会现实、人文历史、精神心理、意识形态、

文化表现等各种领域,具体研究单一功能整体中各类“语言”之间的功能联系,即研究不同“文化”语言的特征和彼此间的功能互依性。由此推知,在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文化层面,作为文化基本范式的符号,其表达意义必然会因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处在永远的变化中,藉“因地制宜”的阐释传达不同的“适切性”内容。易言之,文化符号学绝不能忽视内容意义问题,文本的意义不再只由其内部结构决定,还要由其社会效果确定,社会文本只有与社会功能结合才能构成文本系统的文化这一整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洛特曼将文化描述成“构成文化的本文的一般语言内容层,本文内容层和本文功能层”。^{[7] (594)}可见,塔尔图学派遵循解释学的意义观,强调符号意义的相对性、变化性、共时性和历时性,完全跳出了“形式”的羁绊,而乌斯宾斯基指出,“文化在广义的符号学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确定人与世界之间各种关系的体系,”^{[8] (6)}认为文化是单个语言,或各具功能的各种语言的综合体系,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体系,还是人与现实的联系体系,他更是把历史过程视为通讯过程,相信在其中新的信息流不断决定着各个社会存在的反应。这种开放性的思维视野宽广,逻辑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强,适用范围广,理论完整度高,更利于探讨文化符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文化符号学应注意理论的开放性建设,不能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只研究文本本身,而是把文本当作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把具体文本和人的其它活动即更大的文本、文化环境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强调语言符号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看重符号在作为生物的个人的社会认知中的效用,而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把交流和认知、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的个人心理活动合二为一,甚至视文化交流为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活动,乌斯宾斯基的文化符号学主张语言事关人如何创造自身和世界,即如何塑造人的外形、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种开放性的语言—社会—文化观对揭示事物符号的

本质、符号的结构与意义生成以及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具有指导性意义。从这一维度上讲,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文化符号学跨出了“形式”的泥淖,是开放的符号学,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交融的产物,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语言学上的转向和融合的结果,为文化符号学的开放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中国文化符号学发展的开放性构建

脱胎于苏联文化符号学的中国文化符号学已在本土生根发芽,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任何一种理论在经过一段发展时期后都必然地遇到一些概念混乱、恪守教条、功能单一、视野狭囿、立论偏颇等瓶颈问题,而对于“形式”之殇和苏联文化符号学的经验总结同样会带来开放性启示,有助于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文化符号学克服发展瓶颈。

文化符号学没有象俄国形式主义那样一条路走到黑,相反,他们“集中探讨作为传达内容的机制的语言,以及这种机制所利用的某种基本的符号系统”,^{[9] (59)}洛特曼建议把人类各文化时期和诸历史文化现象都当做开放的文本加以研究,乌斯宾斯基则视文化为一种非遗传性的集体记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外部世界所提供的信息是按不同方式组合并传递的,所以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基本上都把文化视作文本的集合,文本则为功能和意义的载体,并侧重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模型基础上挖掘各文本间等级组成的原则和联系,他们的意图和目标足见深远,而如此宏大的架构自然离不开开放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支撑,这也是在提醒中国的文化符号学者们注意:只有加强符号学的横向关联领域的“混合”研究,不断地引进其它相关学科的“适切性”刺激以打破瓶颈束缚,才能生成一种科学、创新、自由的机制,保持该学科的开放性发展。

当一门学科的基础、功能、方法、效果、体系尚未成熟前,有关该学科的开放性思考和运作永远是必要的和适切的,何况,自近代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很多学

科间已打破了森严的壁垒,往往借助“它山之石以攻己玉”,这种方法在西方学术界也广为流行。正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从哲学、数学、心理学、生理学甚至经济学中吸收了大量描述性知识一样,现代符号学也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合的产物,文化符号学要想对记号、代码、符号、文本、信息、交流等诸子系统做到精确化描述,离开了数学、语言哲学、认知学、心理学、逻辑学、辩证法、解释学甚至伦理学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显然是无法开展的。事实上,雅各布森钻研诗学“形式”的“六要素”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受到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所奉行的精确化实证主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只是引进了科学的技术手段,却忽视了科学的开放性精神,从而给“形式”之殇埋下了伏笔。

简言之,俄国形式主义和苏联文化符号学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或隐或现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底蕴,恰恰是这些开放性的学术因子促进了近现代以来西方文论思想的涌现和革新。有鉴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学者应该具有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和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切记这种开放性研究是双向型的,即在学会整合并运用人类在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要保证所取得的符号学成果有“反哺”功能,为相关学科不断注入新活力,如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注意在异文化现象间寻找语义比较和意义传递的桥梁,为不同的语言符号规定共同的语义单位,以加速相异文化的有效交流;再如,可以尝试把记号过程和认知过程理论、语义歧义识别和解释理论等新成果应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等新兴学科,促进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糅合。

五、结语

开放性是中国文化符号学必备的重要特

质,其发展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必须面向自然和人文科学,服务于社会和大众,因此在诗学和文化批评中尽可能与时代大势、社会大众需要、国家利益、民族传统、人文思想紧密结合,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文化符号学也是一种“接受”符号学,在吸取了“形式”之殇的教训和前苏联文化符号学的经验后要避免炒作和偏执,要迈向历史性、社会性、大众性的接受,要与自然和人文相关学科联姻并互动,只有这样,才能给学术界持续带来新鲜空气,构建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学。

参考文献

- [1] [荷兰] 佛克马, 易布思: 20 世纪文学理论 [M], 林书武等译, 三联书店, 1988。
- [2] [俄] 什克洛夫斯基等著: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C], 方珊等译, 三联书店, 1989。
- [3] 江泽民: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4 年 1 月 24 日), 论党的建设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 [4] 习近平: 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 年 10 月 16 日, 第 01 版。
- [5] 王永祥: 不可动摇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再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J]// 四川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6 期。
- [6] [俄] 米·巴赫金: 巴赫金文论选 [M], 佟景韩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7]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8] [俄] 乌斯宾斯基: 乌斯宾斯基选集 (第 1 卷), 历史符号学, 文化符号学 [C], 莫斯科: 格诺济斯出版社, 1996。
- [9] 张杰: 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塔图图 - 莫斯科符号学理论探索 [J]// 外国语, 2000 年第 6 期。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